



卓越学术文库

地方精英与地域文化变迁研究 (13—19世纪)——以济源为例

DIFANG JINGYING YU DIYU WENHUA BIANQIAN YANJIU 13-19 SHIJI YI JIYUAN WEILI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李留文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济源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	9
第一节 济源的地理环境	9
第二节 济源水利与古代农耕文明	12
第三节 济渎庙国家正祀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21
第四节 天下第一洞天:唐宋时期王屋山道教传统的奠定	27
第二章 金元时期族群冲突背景下的地方精英	36
第一节 金元入主与军功贵族	36
第二节 社长及其权势扩张	43
第三节 王屋山新道教的兴起与势力扩张	47
第四节 全真道士势力扩张下的济源社会	65
第三章 明前中期的制度变革与地方耆老	80
第一节 元明之际的地方社会动乱与移民	80
第二节 国家的制度变革:地方社会的视角	86
第三节 社庙与地方耆老	94
第四章 地方精英嬗变与地域文化的激荡	101
第一节 绅士的兴起	101
第二节 王屋山:道教传统的延续与变迁	145
第三节 村落的分化与组合:村社祭祀的视角	159

第五章 绅士主导下地域社会文化转型	173
第一节 宗族的萌生	173
第二节 清中期以后宗族的普遍发展	187
第三节 社庙的变迁	225
结论	233
参考资料	237
后记	252

绪 论

曾经有好几年,我奔走于济源乡间,济渎水、登王屋、访古庙、觅祠堂,寻古探幽,收集到了大量的民间史料,也对这一区域的历史和现实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济源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地区,北枕王屋,南邻黄河,擅济水、沁水之利,为豫西北形胜之地。王屋山享有“天下第一洞天”的美名,在道教仙境中具有至尊的地位。虽然历经沧桑,我们至今仍然能够找到神秘莫测的神仙洞府王母洞和灵山洞,仍然能够看到众多的道教宫观,如阳台宫、迎恩宫、紫微宫、上方院、天坛总仙宫、清虚宫、奉先观、灵都观、长春观等。

王屋山道教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清派祖师魏华存曾经隐居于王屋山之别宫阳洛山修道,王屋山“天下第一洞天”的崇高地位与这位仙姑有着密切的关系^①。盛唐之时,上清派道士司马承祯来此修道,皇家为其修建阳台宫,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随后也来到这里,潜心修道。这使得王屋山成为道教盛极之地,道教传统就此奠定^②。金元时期,全真教勃兴,因为王屋山“天下第一洞天”的至尊地位,以及它深厚的道教传统,全真教高层道士纷纷来到这里修建宫观,一时间这里宫观林立,道众云集。宋德方、秦志安师徒长期活动于此,他们的《大元玄都宝藏》的编校工作很多是在此完成,对于文化典籍的流传、道教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全真教掌教,如丘处机、李志常、张志敬、王志坦等,均曾在王屋山活动,更有苗道一、完颜德明等王屋山道士在此崛起,入主北京长春宫,可见王屋山在全真教中的地位之高。

① 李留文:《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道教传统的形成》,《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

② 李留文:《王屋山“第一洞天”独尊地位的形成》,《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1期。



延及明清,王屋山道教虽然逐渐远离了皇权,权势大为萎缩,但道教影响早已深入地方社会,和原有的民间信仰交融在一起,对民众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发挥着持续影响力。

行走在济源乡村,可以不时看到村中的祠堂,使人们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浓郁的宗族文化气息。学术界往往以华南宗族作为参照,得出北方宗族不普遍、不典型的结论,但在济源乡村,众多的祠堂以村庄“文化活动中心”的名义被重新修建起来,显示出祠堂曾经的普遍性。据当地老人们讲,民国时期,村村有祠堂,一村往往有多个祠堂,祠堂祭祖、清明坟会都是每年的大事。我在田野考察中,也见到了大量的族谱,有书册式的,更多的是卷轴式的“家堂主”,也叫作“神主”。它们只记本族亡故的祖辈的名字和世系,不记在世者的姓名,每年祭祖的时候,悬挂于祠堂拜殿的正中,供全族祭拜。它们既是家谱,又是神主,简单,实用,廉价,易行,即便是最贫穷的数户同族也会悬挂“神轴”祭拜先祖,这显示出济源地区宗族的普遍性。

从田野调查所收集的民间史料看,金元时期此地并无宗族可言,对于祖先的祭拜不过是在清明时节上坟而已。而民众对各种民间神灵的祭祀却是达到了癫狂的程度,整个乡村也是通过神灵祭祀所形成的村社组织起来的。明代基层民间社会的祭祀内容和祭祀仪式并无大的改变,晚明时期一些仕宦大族、绅士家庭开始修族谱,但宗族仍然不为民间社会所接受,就济源整体社会文化而言,宗族及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说,终明之世,这里的宗族文化影响甚微。然而,入清之后,宗族有了较快发展,康乾时期济源宗族迅速扩张,把多数庶民之家囊括其中,联同宗,起坟会,修家谱,建祠堂,置族田,整个社会宗族化了。

济渎庙是朝廷祭祀济渎之神和北海之神的神圣空间,也是济源最为重要的祭祀场所。济源因济水之源而得名,也因济渎祭祀而设县。隋唐迄于清末,朝廷对于济渎清源神、北海广泽王的祭祀连绵不断,盛大的祭祀仪式宣示朝廷权力的正统性和统治的合法性,显示着国家在地方社会的存在。同时,济渎庙也是社会民众祭祀的空间,早在北宋初年,这里就盛传着类似于“柳毅传书”的“李继安传书济渎神行雨”的神话故事,济渎清源王从此拥有了行雨的神格。济渎庙中还有潮赐投物的习俗。济水源头众泉奔涌,形成一个数十亩大小的水潭,俗称“小北海”,或称“龙池”。泉水常年奔涌不止,十分神奇,因此吸引来很多的信众。求药者投币于池,求子者投银婴于池,有浮出者则认为是神的赏赐(实则为向上奔涌的泉水托出)。正因为如此,济渎庙在民间拥有众多信徒,明清时期,每年三月,方圆数百里的信众纷至沓来,摩肩接踵,香烟缭绕,昼夜不息,因此形成了盛大的济渎庙会。在这里,朝廷有朝廷的宣示,民众有民众的祈求,虽然地位不同,观念不同,礼仪



不同,却共享着这一神圣空间,在这种共享中,朝廷的权威渗入民众思想,也奠定了来自民间的广泛认同的信仰基础。

济渎庙作为朝廷岳渎祭祀的神圣空间,朝廷、官府固然一直是这个祭祀场所的拥有者和祭祀活动的主导者,但它并不一直是这里的实际管理者。早在隋唐时期,朝廷在济渎庙专门设有济渎令,又有济渎令的属官祝史、斋郎,整个济渎庙祭祀及日常事务均由朝廷派出机构来管理。但不知何时,这些机构和官员不见了,道士进入济渎庙,成为济渎庙的管理者。济渎庙作为朝廷祭祀济渎清源王、北海广泽王的神圣场所,居然修建起来了道教的天庆宫、玉皇殿,道士们把济渎庙改造成为了一座道观。同时,民众也进入这一空间,修建起来了广生殿,民间善人同样参与到济渎庙内部分事务的管理,使济渎庙呈现出民间杂祀的色彩。入清之后,朝廷的祭祀大典开始邀请当地绅士参与其中,逐渐地,绅士接手了包括庙会、庙产在内的整个济渎庙日常管理事务,道士仍然居住庙内,但只是负责洒扫而已。

王屋山道教、乡村的宗族以及作为朝廷祭祀空间的济渎庙像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纷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显示出济源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厚重。然而,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观察到的文化风景画其实是历史上各个时期文化传统的积淀,它其实是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性的发展。金元时期王屋山作为全真教重镇,道教势力经历了极大的扩张和发展,道教文化深刻影响了乡村社会文化风貌。明清时期虽然全真教势力走向衰落,但作为金元时期的一种传统,一种文化基因,其影响在乡村社会延续不断。清代康乾时期,宗族在乡村社会普遍建立起来,坟会、族谱、祠堂以及祭祖仪式成为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象。如此,从金元时期道教的繁荣到清代宗族的普遍发展,济源地方社会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文化转型。之所以称之为文化转型,是因为金元明清七百余年间济源地方社会所经历的,不仅仅是道教和宗族的此消彼长,而是以道教和宗族相互消长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变迁。民间信仰经历了道教的广泛渗透和宗族的改造,比如在济源,宗族往往会把称为“堂”的乡村小庙改造成为本族的神庙,有的宗族会在祠堂里摆设本族所供奉的神灵,同祖先敬拜并行不悖;民间社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神灵祭祀为基础形成的村社是金元时期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清代,村社以宗族为依据发生了普遍的分化,众多的再生小社以宗族为单位发展起来,而且,官府强加给乡村社会的里甲、保甲等组织也逐渐以新的村社为组织资源演变成了乡地组织;入明后朝廷长期推行的学校、科举制度的社会效果在晚明开始彰显,绅士群体势力崛起;水利工程在明代中期开始兴建;宗族的兴起导致赋役征收方式的改变,宗族在赋役征收中的角色开始突显;同时,基层民众的社会交往、田产出让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从乡村社会文化的角度,我们称之为文化转型。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金元时期的文化经历有明一代的演变,到清代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型?这一转变似乎与北方的族群冲突、朝代更迭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转变具有相关性,但在“国权不下县”的背景下,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如何影响百姓日常生活和地方文化?在济源地方乡村社会七百余年的社会变迁中,我们注意到了介于官府和民众之间的一些特殊群体,在金元时期有全真道士,有军功贵族,有社长,有耆老,在明代有绅士、耆老、善人,也有道士,有清一代,则主要是绅士、商人、耆老以及民间信仰中的善人。他们作为地方社会的权势群体,往往与官府存在合谋,是官府依赖的对象,因而对地方事务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每一个权势群体都拥有一套自己所秉持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系统,他们凭借在地方社会的支配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把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推行于广大民众之中,从而对地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金元明清七百余年间,地方权势群体随着族群关系、朝代更迭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进行着新陈代谢,地方权势群体的变化又进一步影响到区域文化的变动。所以,这个介于官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权势群体是理解地方社会和区域文化的关键,我们称之为“地方精英”。

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研究经历了从士绅(或称之为“绅士”“乡绅”等)到地方精英的理路演变。

早期的士绅研究多是整体性的宏观描述和分析,吴晗和费孝通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吴晗关注绅权和皇权的关系,在他看来,皇权与绅权存在着共生关系,但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这个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大致经历了秦至唐、五代至宋、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在这三个时期,皇权与绅权经历了从“共存”到“共治”再到“主仆”关系的变化过程,他以此来说明绅权走向没落的趋势。他同时还讨论了绅士所拥有的种种特权,对这一权势群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的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指向,是在社会革命的大背景下针对梁启超等人的“欲兴民权先兴绅权”“兴绅权是当务之急”的论调而发,其间散发着以西方意识形态为背景的批判旧社会的强烈气息。费孝通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进入士绅研究领域的:“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里不曾发生中层阶级执政的政治结构?”所以他的研究具有西方社会参照下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特点。^①

来自海外的中国学研究者有着和吴晗、费孝通相近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背景。早期的美国中国学界,张仲礼以翔实的数据分析了绅士的构成、特权、地位、职责、收入、制度基础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萧公权的研

^①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8年版。

究揭示了绅权与国家权力的一致性和对抗性。瞿同祖则从州县权力运作的角度讨论了绅士在地方社会的作用。^① 他们的研究一方面着力于对于绅士群体以及中国社会的运行和结构的探讨,另一方面要回答“中国为什么落后”这一问题。日本学者的研究,从小山正明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到重田德的乡绅统治论,背后都有一个通过中国社会结构的讨论探讨中国社会“停滞”原因的问题意识存在。^②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是海外中国学界开始用“地方精英”替代“士绅”。概念转换的背后是研究理念和研究思路的变化,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具体的区域,更加注意研究对象的异质性,注意区域社会多元权力的实际运转。

周锡瑞对晚清鲁西北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在他那里,地方精英是在地方上行使支配权力的个人或者家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场域”的概念,以此来指称地方精英涉入其间的环境、社会舞台、周围的社会空间。场域可以是地理上的村庄、县、国家,也可以是功能上的,同时还包含了构成此场域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象征和资源的集合。^③

孔飞力则使用了“名流”的概念。他依据社会影响力把名流分为“全国性名流”“省区名流”“地方名流”三个级别,从而讨论了名流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地方势力的扩张和官府权力的萎缩^④。杜赞奇的研究更加注重文化的视角,他吸收了后现代关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在他看来,这个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人们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是地方精英产生的基础。他把地方精英概括为“保护型经纪”和“盈利型经纪”,进而讨论了国家政权建设所导致的乡村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破坏和地方精英嬗变^⑤。同样是关注社会动荡时期的地方精英,孙竞昊的研究对象是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他注重绅士的地方

① 见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② 狄金华、钟涨宝:《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变——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ited,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另外参见袁海燕:《绅士、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④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属性,他们通过文化、教育、慈善等活动塑造地方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由此建立起他们在地方社会的文化霸权,所以社会动荡之时,他们借此扩张势力,把自己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孙竞昊对济宁士绅在地方社会的文化构建以及由此建立的文化霸权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①

科大卫华南研究的核心问题虽然是宗族,但士绅却是绕不开的问题。他把宗族、士绅置于华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把握,当国家力量挟理学的意识形态大力向华南社会渗透的时候,华南士绅即以这套话语来包装自己,以获得正统性,于是宗族作为一套国家认同的话语被创造出来。科大卫把华南社会的宗族化的过程称为地方社会的士绅化,士绅是宗族的构建者,而宗族的话语又使士绅成为地方社会的真正权威和支配者。科大卫的宗族、士绅研究呈现出一幅幅地方社会鲜活的生活画卷,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②

综上所述,地方精英的研究经历了从士绅到地方精英的范式转换,由宏观到微观,逐渐深化,不断推进,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把地方精英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显现出很大的创新空间,成为历史认知新的增长点。然而,迄今为止主要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华南、西南等边疆地区,讨论的问题多是国家力量向边疆社会的推进和渗透过程中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以及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而包括中原在内的北方区域社会的研究仍然非常薄弱。相对于华南、西南等“边疆”地区,北方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是王化最早的地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整合几经变迁,地方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传统和文化景观。靖康之变是北方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靖康之后,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山河残破,民生凋敝,迅速地边缘化了。但明代之后,这里经济恢复,又成为繁庶的地区,人口密度不亚于江南,是影响国家局势的重要地区。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北方地区自靖康迄于清末的历史变迁过程仍然模糊不清,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济源是本书研究的核心县域,笔者希望以此为个案认识金元明清七百余年北方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如上所述,金元时期王屋山全真道教盛极一时,清代民间社会宗族普遍发展起来,这可以作为济源区域社会七百余年的长时段历史发展的主线,其中又包含着民间信仰的渐变,基层社会组织的组合与发展,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持,社会的叛乱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等复杂的社会内容,呈现出以民众日常生活的展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风貌的变

① 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迁。笔者把济源地方社会所见之道教、宗族、民间信仰、基层社会组织、民众日常生活等诸多事象称为“地域文化”，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主题。^①

地方精英则是“地域文化变迁”研究的切入点。本书选择使用“地方精英”，而不使用“士绅”的概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关于地方权势群体，本书强调的不是他们的身份，而是地方社会权力关系和权力的实际运作，他们对于文化资源的控制和利用，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即使是清代绅士建立起他们在地方社会的绝对权威，他们也不能够完全把商人、耆老、善人等群体摒弃于权力之外，乡村社会仍然是权力多元的。因此，在着眼于区域社会实际运作的研究中，“地方精英”比“绅士”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第二，本书研究时段从金元时期到清末，持续七百多年，而绅士在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权势群体出现是明朝以后的事情，金元时期乃至明代前期，真正在地方社会居于支配地位的乃是地方耆老、社长、道士、军功贵族等。要研究金元明清这一长时段的权势阶层的变迁，绅士这一概念明显缺乏概括力。所以，在本书语境中“地方精英”要比“绅士”更为合适。

因此可以说，本书的研究旨趣在于：以济源为个案，通过金元明清七百余年这个区域地方精英嬗变过程的讨论，并通过他们的社会活动和各种互动关系的分析，探讨济源区域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理解地域文化变迁的社会机理和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要介绍济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耕作制度、水利状况以及悠久的历史 and 道教文化传统，把本书关于济源的研究置于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之中。第二章主要讨论金元时期族群冲突背景下的军功贵族、社长和全真道教集团等新的地方精英的崛起，讨论全真道教的勃兴及其在地方社会的渗透。第三章主要讨论元明之际的战乱和移民，讨论国家礼制转型在地方社会的展开、乡村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以及全真教的衰落和部分宫观的村庙化过程。第四章主要讨论济源绅士群体在晚明的兴起和清前期的扩张，讨论官绅共治背景下地域文化的激荡与变迁。这一时期尽管绅士群体迅速崛起，但因为他们缺乏话语平台和组织资源，因而在文化上他们无法获得民众对于他们所秉持的理学思

^① “地域文化”是一个在多个学科、多种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概念，没有十分准确的内涵和清晰的外延。一般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地域文化”专指先秦形成的、为司马迁所概括归类的中国不同地域的民俗类型和文化传统，而广义的“地域文化”则不论古今，指称某一特定区域的生计类型、生活方式、组织形态、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等事象的综合。所指区域可大可小，大到一国，如中国、印度，一个地理区域，如岭南、华北，小到一个小的流域，如汉中、南阳盆地，一个县，如济源。本书“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指以济源为中心的一个县级区域，其境内有道教名山王屋山、国家祭祀场所济渎庙，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



想的认同,从而主导民间基层社会的话语权,所以他们不得不参与到王屋山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祭祀活动中去,由此获得下层民众的认同。在这些仪式中,绅士和地方耆老共同构成地方精英的核心。第五章主要讨论了绅士主导下的民间社会宗族大众化的过程。绅士群体的进一步壮大,理学话语趋于强势,借力于赋役征收制度变革,宗族在康乾时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民间社会出现了宗族大众化的趋势。宗族大众化导致旧有村社的分化组合,导致了旧有的社庙系统的变化,导致了民众日常生活的转型。



第一章

济源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



第一节 济源的地理环境

济源属古代的河内地区,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南临浩浩黄河,与古都洛阳隔河相望;北依巍巍太行,与山西阳城、泽州为邻;东为一望无际的华北冲积平原,去城约 20 公里与河内(今沁阳)、孟州接壤;西北为高峻的王屋山,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从县城西去,越王屋,过邵原,就是山西垣曲县了。晋豫交界,毗邻洛阳,山河表里,济源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这里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先民们在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境内有大量石器、陶器出土。济源夏商两代属畿内,周代有原、向等众多封国。秦汉时期为轵县,其中秦代属三川郡,从汉代一直到隋代,大部分时间属河内郡。隋代对于济源来说是一个重要时期,开皇二年(582),朝廷在济水之源创建济渎庙,开皇十六年(596)析轵县北部,置济源县。到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将轵县并入济源县,属孟州,后来一度属洛州。今天的济源王屋山西部一带,周代为邵康公封邑,后周置王屋县,先后归属怀州、孟州,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省入济源县,基本形成了今天济源的版图。行政区划上,济源县明代之前同山西更为接近,金代属河东南路,元代时属怀孟路(后称怀庆路)孟州,同山西一起归中书省直接管理。入明之后,孟州被裁撤,济源归怀庆府直接管理,同怀庆府其他州县一起划归河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机构管辖。

从地理交通方面说,济源西北虽有崇山阻隔,出入多迂,但实际上群山之间有条条山路通往山西。金元明清时期济源地方同山西的交往极为频繁,最主要的道路有三条:

第一条道路是出济源城西去,过狐岭(今称虎岭),出轵关、邵原,进入山西垣曲县,向北过侯马、洪洞、介休可到太原。这是著名的太行八陉的第一陉,为河南进入山西的要冲。晚清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天国北伐军攻



怀庆府城未下,就是经这条路进入山西的。

第二条道路是从五龙口处渡沁河,经贺坡、山口等村,逾太行山,经衙道通往泽州。现在的国道207即为此路。这条道路北通泽州、潞城、太原,南过济源南程、瑞村、东添浆等村,在白坡渡过黄河,通往洛阳,东达开封及江南地区,是济源最重要的商道。在该路的太行山险要处,有一通康熙年间的残碑,表明这条商路的重要性。该碑云:“大清国河南怀庆府济源县……东北三十余里,古太行山沟口,乃通山西之道,而日久风雨损坏,其路甚……亦……主……或意合募……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六竣工,路……三万工,以……遂刻碑……”^①碑刻严重剥蚀,从断断续续的文字中,可以知道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这次商路修治耗费工时三万个,由此推测,这可能是一次政府行为。道光七年(1827),这条道路得到又一次的修整,不过这一次是民间行为:“山西、河南相隔太行,虽山径蹊间,人力可通,而执鞭推毂,每难从事。此不能通功易事于彼,彼不能此有易无于此,凡托处其地,秋夏谨□垦土坡,暂为糊口,冬春无买卖,商贾难以聊生,室家座困,不嗟叹□□乎?西窑□侯公讳兰馨有志未逮,其子希贤,继志求事,请客劝捐,以成厥功,河南地界共派十工,所历村庄捐输者不少,效办者孔多,争先恐后、不愈月而工程先竣矣。”^②此次修路首事者叫侯希贤,在他的倡导下,沿途居民“争先恐后”出钱出力,碑文后有沿商路各村捐款人的名字,由此可见,晋豫两省间的商业往来已经成为当地居民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这条商路在济源瑞村地方,被东流的蟒河所断,来往商贩跋涉甚艰。雍正年间,乡人李国安等人倡修仙灵桥以通往来。进士何达善为之撰写碑文,其中谈到当时商业的兴盛局面:“邑东二十五里瑞村界有南北衢,乃晋原抵野戍之便道,推车担贩,络绎不绝。”^③该碑刻再次显示出这条商路的重要性。

第三条道路是从济源县城北上过克井、郭庄通往山西阳城的,也就是今天的济阳公路(济源—阳城)所走的路线。这条路在新修《阳城县志》中也有记载:“抗战前,县内主要出境道路有三条,……再次为经城东窑头、白桑、东冶、三窑,过吊驴桥,入济源县。”^④

以上是济源去往山西的三条主要道路,分别通往泽州县、阳城县和垣曲县。除此之外,崇山峻岭间,还有数条崎岖小路,通往山西阳城。一条经过

① 侯飞主编:《济源公路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该碑为残碑,其附记云“(碑)在济源市东北太行山沟中村山沟之中,倒伏日久,字迹漫漶”。

② 《修路碑》,拓片存济源市文物局。

③ 何达善:《创修仙灵桥记》,乾隆《济源县志》卷十五《艺文》。

④ 阳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阳城县志》,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莲花隘,该隘口“位于济源市西北部,与山西阳城县横河乡接壤,海拔 1000 米,隘道长 500 米,宽 0.7 米,……林密山高,沟深道窄,古为济源至阳城险道”。一条经过磨石渠隘,该隘口距离莲花隘不远,“西有云蒙山,东临鳌背山,林茂山高,沟深路窄,隘长 1000 米,通道最宽处 1.5 米,该隘被视为济源与阳城锁钥之一”^①。这两条山路在《阳城县志》中也有记载:“出境道路还有:经河北、黑龙、秋川河出莲花隘,入济源县。经石臼、桑林、洪水村,出窟窿山入济源县。”^②其他山间小道尚有很多,顺治《怀庆府志》卷首济源县图中,北部山峰间从东到西依次有东白涧口、皂君垛、会道口、西白涧口等隘口,这些都是通往山西的山间小路。条条山间小路连接着大山两边的人们,战乱时期,更是百姓避难的通道,元明之际的战乱时期,很多的山西人就是通过这些道路逃到济源的。和平时期,这些道路上商旅不断,密切着大山两边经济往来。从方言的角度分析,这里同黄河南岸的郑州等地有着较大差异,而同山北的泽州、阳城颇多相近之处。这也充分说明通过这些山间道路所形成的大山两边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

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工具之一是手推车,载重一般为二三百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可以见到。这种运输方式非常耗费人力。所以最主要的是牲畜驮运。《济源市志》记载:“直到民国时期,畜驮常成群结队,来往于晋豫两省,驮来煤炭,驮去粮食、棉布。新中国成立初期,济源山区运货仍靠畜驮,畜驮中驴、骡较多。(驴、骡)经过磨炼,善走山间险峻小道。”^③因为这里属于山西商人出山门户,商贩络绎不绝,所以民间有大量毛驴喂养,以至于驴肉丸子成为这里特色食品。

济源位于西安、潼关通往中原腹地的东西交通要道附近。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水源充足,土壤肥沃,从西周至唐末,多有王朝建都。从关中出潼关,经洛阳出虎牢关至荥阳,从荥阳可以东达齐鲁,北通燕赵,东南至吴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官道。济源就位于这条官路的北边,而且,由孟津渡河,经济源、沁阳到卫辉,顺卫河而下,东北直达天津,这是出关中通往京津地区更为便捷的道路。当年武王伐纣,由孟津渡河而东出牧野,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所以,看似偏僻的济源,其实乃四通之地。

济源南临黄河,擅水运之利。济源沿黄渡口众多,主要的有河清渡、官

① 《济源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济源交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 页。

② 《阳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阳城县志》,第 186 页。

③ 《济源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济源交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8 页。



阳渡、毛田渡、长泉渡等,这些渡口在济源和洛阳之间建立了密切而频繁的联系。水运是济源同外界联系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开封、淮安等处沿黄河水路可以一直到陕州(今三门峡)附近,然后走陆路过潼关,西去关陕。山西、济源的货物也常常沿黄河顺流而下,销往各地。如《孟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孟县的协兴居粮行粮食全从山西柳林通过船只运来。”^①济源沿黄河有“毛田、西岭、牛湾、长泉、关阳、交兑、蓼坞、河清口、坡头等9个渡口,旧中国沿河90%以上群众以航运为生”^②。“抗战前,仅大峪乡的关阳镇,农户就拥有各种运船300余只。不少船户将货物水运至山东济南等地后,因逆流返航不易,就将货连船卖出,返乡后重造新船。”^③水运加强了济源同外地的经济联系。

总之,济源为古河内之一部,是处于晋豫两省交界地带的独特区域,西、北有太行、王屋之险,东、南有黄河、沁河、卫河之利,形似偏僻,实则处于山西通往江南、关中通往京津地区的交通要道。

第二节 济源水利与古代农耕文明

司马迁曾经讲道:“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④河东、河内、河南三河之地在“天下之中”,济源为河内地,又在三河的中心地带,其农耕文明久远。河内沃野千里,盛产谷物,是古代中原王朝统治的重要根基。东汉光武帝更是以此成就霸业。史书记载,当年邓禹曾经向刘秀献计:“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于是刘秀任用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寇恂不负刘秀所望,“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为刘秀的中兴大业立下汗马功劳^⑤。河内的殷富奠定了刘秀中兴之基,河内的殷富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昌盛的基础——粟米万石。

济源位于沁阳的西部,北连山而南带河,拥有优越的农耕条件。

① 《孟县志》编纂委员会:《孟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0页。

② 济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济源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③ 《济源交通志》编纂委员会:《济源交通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④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2~3263页。

⑤ 范曄:《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621页。



济源市面积约两千平方公里,北部、西部为山区,面积广大,约占全市面积的 68%,有太行山、王屋山、鳌背山、齐子岭、玉阳山、孔山等名山,最高处海拔 1955 米,山势险峻,气象万千。南部、东南部为黄土丘陵区,约占全县面积的 20%。中部、东部为平原,面积约占全县 12%。据新修《济源市志》讲,这里土壤属两合土和红黏土,有机质含量高达 1% 以上,保水、保肥性能好,非常肥沃^①。县城位于这一区域,同时这里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

境内除南部黄河外,还有众多河流蜿蜒流过。沁河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它从山西逶迤而来,在济源东北部的孔山进入平原地带,东入沁阳。济水于济渎庙和龙潭寺发源,东入沁阳,穿府城流入沁河^②。蟒河、湨河在县东河合村处汇流后,入孟州,东南流入黄河。其他的还有大店河、铁山河等。这里属于我国地势第三阶梯向第二阶梯的过渡地带,东南湿热气流受到北部、西部高峻山脉的抬升,形成了较为丰沛的降雨,“雨量中心在虎岭—竹园一带(降水量在 800 毫米以上)”^③。众多的河流和较为丰沛的降雨使得这里一般年份水资源较为丰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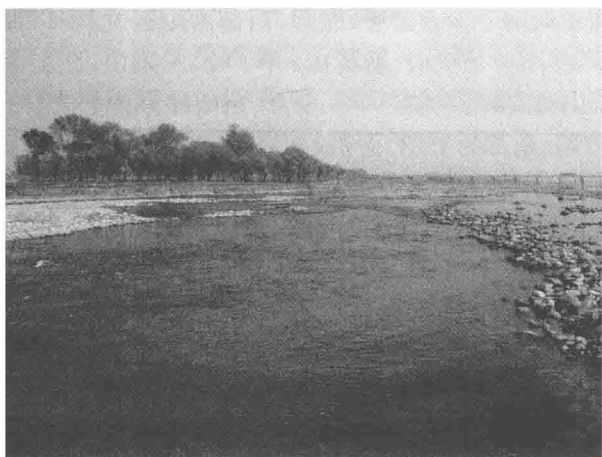


《水经注》记载的沁、济水系

① 济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济源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6 页。

② 今出济渎庙后东流 10 公里,汇入蟒河。

③ 济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济源市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9 页。



秋天,五龙口静静流淌的沁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位于高处的山西省,其地下水渗透下来,在太行山麓形成众多汨汨腾涌的泉水,济水就是其中之一。济渎庙西北有一个叫“万泉寨”的地方,村子周围泉水多得没有人能数得清到底有多少。刘大观在纂修《济源县志》时,专门派人调查济源县内各处泉水,写出《济源九十九泉》一文,收入县志。奔涌的泉水充满了神奇,济渎庙内济水河道中的珍珠泉汨汨涌出,像串串的珍珠,至今尚可见到。拔剑泉更是有着离奇的传说。清代,济源铁岸村有一座“伍将军庙”,庙中有嘉庆十五年(1810)的“伍将军碑”,记述了该村杨作栋等人重修伍将军庙的事情。据当地民间传说,当年伍子胥带兵路过此地,适遇大旱,无处觅水,士兵焦渴难耐。天黑了,他插剑于地,悻悻而卧。夜半,忽然听到地下有汨汨的水声,他翻身而起,拔剑在手。就在这一瞬间,地下的泉水顺着剑孔奔腾而出,士兵欢呼雀跃。自此,汨汨喷涌的泉水浇灌着附近的田园,世世不竭。后来,百姓在此地修了一座庙宇来纪念他。故事当然是出于当地百姓的创造,但泉水却是很早就有。宋代文彦博曾有一首诗吟咏此泉,诗云:“拔剑隆平近北坎,一溪独涌胜群涓。仍思昔日天工巧,演出雄源灌玉川。”^①

丰富的水资源使这里很早就出现了灌溉农业。沁水进入平原的地方叫五龙口,又名枋口,据说秦代以枋木为门,引水灌溉,故名枋口。魏司马孚代之以石,隋代怀州刺史卢贲修利民渠、温润渠,灌溉民田;唐代河阳节度使温造大修枋口渠道,灌溉济源、河内、河阳、温县、武陟五县田地一度达到 50 万

^① 北岸:《拔剑泉记》。见《济源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267 页。